

国际视野下的跨文化交际平台建设

经费编号：B-6001-13-114202

后殖民视域下的 戴乃迭文化身份与译介活动研究



王惠萍◎著

A Study on Gladys
Yang's Cultural Identity and
Translational Activities from the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后殖民视域下的 戴乃迭文化身份与译介活动研究



王惠萍◎著

A Study on Gladys
Yang's Cultural Identity and
Translational Activities from the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殖民视域下的戴乃迭文化身份与译介活动研究 /
王惠萍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166-1141-8

I . ①后… II . ①王… III . ①戴乃迭（1919 ~ 1999）
—人物研究 IV . ① K835.6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65780 号

后殖民视域下的戴乃迭文化身份与译介活动研究

作 者：王惠萍

出版人：张百新

责任编辑：王晓娜

特约编辑：杨 罡

封面设计：凤凰树文化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a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北京凤凰树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mm × 240mm

印 张：15

字 数：26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2014 年 9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1141-8

定 价：4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10-65462436



作者简介

王惠萍 女，1973年7月生于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现任教于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从事翻译与文化研究。2013年9月至2014年8月，应著名翻译学者Mona Baker之邀，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中心访问学习一年。近年来，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权力与操纵——也谈林纾的翻译》《东方学与中国文化身份建构》《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戴乃迭译介活动研究——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的译介》等多篇学术论文，并主持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译者的文化身份与译者的职责——20世纪外籍代表译者英译中文著作之策略研究”（批准号：11YJC740101）。

本著作由上海师范大学内涵建设项目资助出版
(项目名称：国际视野下的跨文化交际平台建设，经费编号：B-6001-13-114202)

序

冯庆华

得知王惠萍即将出版她的第一部个人学术专著，作为她博士生时期的导师，我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这部专著是由她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三年前王惠萍刚刚跨入上海外国语大学时，即表达了对译者文化身份的兴趣。当时她向我提到有意研究英籍译者戴乃迭，一位为学者们忽视的伟大翻译家。多数学者关注更多的是杨宪益和戴乃迭合译的作品，但是关于戴乃迭个人的翻译风格和翻译成就，可以说目前仍然乏人问津，这是中国译者研究领域的一个欠缺。王惠萍表示愿意在这方面做一些探索，这正是她撰写博士论文的初衷吧。在这之后，她便开始认真地搜集相关资料，并利用语料库知识，建立了沈从文《边城》的四个英译本语料库，以研究戴乃迭英译《边城》的独特风格。

王惠萍对科研十分投入与执着，当她得知我刚购得金介甫的《边城》译本，便立即向我借去复印并扫描了这本书。而为了获得《边城》的第一个英译本——刊登在民国时期《天下》杂志上的项美丽译本，她特地去了徐家汇藏书楼，以不菲的价格复印了这个珍贵的译本。一丝不苟地研究精神终有回报，历经三年的努力，王惠萍的博士论文终于完成了，并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好评。

近年来，虽然关于译者文化身份的研究日益增多，但却鲜有论文对译者文化身份的特点进行系统的研究。这部著作从后殖民主义理论入手，较好地把握了后殖民主义思潮的丰富内涵。她详细梳理了现代翻译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发展，在详细论述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对翻译学科影响的基础上，深入阐释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几个重要概念：翻译、权力、译者主体性、文化身份和异化翻译，体现了对西方翻译理论娴熟的运用。整部著作的理论陈述富有条理，视角新颖独特。著作研究的主题是戴乃迭的文化身份与译介活动，结合对戴乃迭代表译作的分析，对戴乃迭文化身份的特点作了深入的探索。王惠萍指出，从宏观角度看，戴乃迭具备双重民族文化身份，在翻译活动中主要体现为杂合性、协商性、流动性的特

点。而从微观角度看，戴乃迭又具备女性文化身份，这与她的双重民族文化身份是交相辉映的，戴乃迭在译介新时期女性作家作品时，充分关注了中国女性的现状，凸显了作品的女性主题。

难能可贵的是，王惠萍的著作在注重理论性和思想性的同时，全面运用了定性与定量研究、共时与历时研究的方法，使研究结果更为真实可信。王惠萍通过建立《边城》四个英译本语料库，运用多种语料分析软件对译本加以细致的研究。与此同时，她又结合译作中具体的翻译实例，详细阐释了戴乃迭的翻译风格。在以往的戴乃迭翻译研究中，学者们往往仅关注其某一时期的某部译作，而缺乏历时的维度。王惠萍则通过对戴乃迭不同历史时期代表译作的分析和比较，提出“戴乃迭在不同时期运用的翻译策略是不同的”这一论断，认为在其后期的翻译中，戴乃迭更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这正是译者文化身份流动性的体现，而译者的文化身份又受制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种种权力因素。

在对戴乃迭的女性文化身份进行研究时，王惠萍又运用了共时研究方法，对同一时期的《沉重的翅膀》的戴乃迭译本和葛浩文译本加以比较，并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剖析了戴乃迭的女性主义翻译策略，指出它不同于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策略，而这归根结底是由戴乃迭东西方交融的文化身份所决定的。著作的论述深入具体，内容丰富详实。

王惠萍对译者文化身份研究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2011年她申请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名称为“译者的文化身份与译者的职责——20世纪外籍代表译者英译中文著作之策略研究”（批准号：11YJC740101），并在国内各类刊物上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王惠萍前期的研究为撰写这部著作奠定了基础，她在对戴乃迭译介活动的研究中，依然着眼于译者复杂的文化身份以及制约文化身份的种种权力因素之上。在读博的第三年，王惠萍获得了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中心访问学习的机会，师从著名翻译学者Mona Baker。这一年的留英学习使她在提升翻译专业知识的同时，更深刻体会到了中英文化之间的差异，对戴乃迭中西交融的文化身份以及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的种种困难，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王惠萍的著作通过对戴乃迭这位译者的研究，对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也同时提出了富于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希望这部著作的出版能够为戴乃迭及中国文学译介的相关研究提供有益的资料和启示，也祝愿作者能够站上一个新的台阶，在未来的研究中再接再厉，有更好的科研成果问世。

目 录

序 (冯庆华)	001
---------------	-----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缘起与背景.....	001
1.2 研究意义与目标.....	002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	006
1.4 研究内容与框架.....	008
1.5 本章小结.....	010

第二章 研究基础

2.1 翻译研究学科的发展.....	012
2.1.1 翻译研究学科的奠定	013
2.1.2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015
2.2 后殖民翻译理论的形成.....	016
2.2.1 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发展	017
2.2.2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发展	020
2.2.3 翻译研究的权力转向	021

2.3 后殖民翻译理论的重要概念	023
2.3.1 翻译	023
2.3.2 权力	024
2.3.3 译者主体性	027
2.3.4 文化身份	029
2.3.5 异化翻译	033
2.4 戴乃迭译介活动的相关研究	035
2.4.1 相关期刊论文和硕博士论文	035
2.4.2 相关著作	043
2.5 本章小结	044

第三章 戴乃迭译介活动综述

3.1 戴乃迭生平简介	046
3.1.1 童年的记忆	046
3.1.2 重圆中国梦	047
3.1.3 多舛人生路	048
3.1.4 永恒的微笑	050
3.2 戴乃迭译介活动的不同阶段	051
3.2.1 30年代末至40年代末：尝试奠基期	051
3.2.2 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发展成长期	052
3.2.3 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挫折停滞期	056
3.2.4 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成熟高产期	057
3.3 戴乃迭独立译介的主要作品介绍	061
3.3.1 现代文学作品	061
3.3.2 当代文学作品	062

3.4 戴乃迭译介作品的接受效果	065
3.4.1 专业人士的评价	065
3.4.2 普通读者的评价	069
3.5 本章小结.....	071

第四章 戴乃迭的双重民族文化身份与其译介活动

4.1 戴乃迭的双重民族文化身份.....	074
4.1.1 中国——一生的眷恋	074
4.1.2 英国——不变的故土	076
4.1.3 “我有两个祖国”	077
4.2 戴乃迭的翻译风格——以《边城》英译为例.....	079
4.2.1 戴乃迭的翻译观	079
4.2.2 《边城》四个英译本语料库简介	082
4.2.3 《边城》四个英译本语料库统计结果	084
4.2.4 《边城》四个英译本的实例对比分析	096
4.3 文化身份的杂合性与协商性——戴乃迭翻译风格成因.....	100
4.3.1 《边城》四位英译者文化身份与译介策略比较	100
4.3.2 文化身份杂合性与协商性的体现	107
4.4 文化身份的流动性——戴乃迭前期与后期翻译风格比较	112
4.4.1 50 年代初至 60 年代中期	113
4.4.2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末	125
4.4.3 文化身份流动性的体现	138
4.5 本章小结.....	142

第五章 戴乃迭的女性文化身份与其译介活动

5.1 西方女性主义及其翻译理论.....	144
5.1.1 西方女性主义概述	144
5.1.2 加拿大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145
5.2 后殖民女性主义及其翻译理论.....	148
5.2.1 后殖民女性主义概述	148
5.2.2 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150
5.3 戴乃迭对新时期女性文学的译介.....	152
5.3.1 新时期女性文学	152
5.3.2 新时期女性文学的译介内容	155
5.3.3 新时期女性文学的译介方法	156
5.4 《沉重的翅膀》两个英译本译介方法比较.....	163
5.4.1 翻译副文本	163
5.4.2 翻译方法	169
5.5 戴乃迭其他译作中的女性主义翻译策略.....	175
5.6 本章小结	180

第六章 结论

6.1 戴乃迭文化身份与译介活动总结.....	183
6.1.1 戴乃迭的双重民族文化身份对其译介活动的影响	183
6.1.2 戴乃迭的女性文化身份对其译介活动的影响	187

6.1.3 戴乃迭译介活动对中国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	188
6.2 戴乃迭译介活动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启示	190
6.2.1 翻译选材	190
6.2.2 译介渠道	192
6.2.3 翻译策略	193
6.2.4 译者模式	196
6.2.5 翻译目的	198
6.3 本研究存在的局限和不足	199
6.4 本章小结	200
附录 1 论文图表索引	202
附录 2 戴乃迭翻译作品目录	204
附录 3 戴乃迭著述目录	210
附录 4 与赫曼斯教授的谈话摘录	211
参考文献	213
后记	226

戴乃迭在学术上是半个哲学家。他除了获得《中风》的第一个批评奖——也是此书评奖《毛毛》之后的第二个奖项之外，还被给予了哲学博士学位。从本质上讲，这不外乎是两本《毛毛》不同版本的学术评价。《毛毛》中的好意、天真和智慧是无法言喻的。其解开了寻求智慧的迷雾。

近年来，戴乃迭学术研究大有长足进展，研究对象从之前的译者文化转向对读者批评的研究。而学者作品从新现实主义理论入手，进而探讨了批评上更深层次的丰富内涵。这样构现出了现代翻译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关联。批评学与戴乃迭的文学研究对批评学界来说大有裨益，深入剖析了戴乃迭文学观的几个重要概念：童年、成长、语言文化学、文化背景和音乐理论。华川丁对戴乃迭研究的重视，展示了戴乃迭研究的广阔前景。但是，戴乃迭研究在研究领域上还是需要更多的研究者关注。同时，戴乃迭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应该为译文学者提供更多的深入研究，且要开拓出从宏观到微观、从方法论到具体研究范式的双重视角。在此研究活动中，戴乃迭的学术贡献，以及他的文学研究，都值得我们去深究。

第一章 絮論

1.1 研究缘起与背景

本书由我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我对戴乃迭的研究最早开始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习的第一学期，导师冯庆华教授开设了“译者风格研究”这门课程。一次课上，先生向我们讲述了翻译家杨宪益的翻译作品与风格，以及他与夫人戴乃迭传奇跌宕的一生。当先生问及戴乃迭独立翻译过的作品时，无人能答上来。大多数同学只熟悉戴乃迭与杨宪益合译的作品，如《红楼梦》《鲁迅选集》等。先生说道：“戴乃迭是一位伟大的翻译家，她独立翻译了许多作品，并且她的翻译风格与杨宪益非常不同，希望能有人做些这方面的研究。”这句话引起了我的好奇，从那时起，我便开始关注与戴乃迭译介活动相关的资料。这仿佛打开了一座金库的大门，在我面前展现的是令人震撼的、取之不尽的宝藏。当我阅读戴乃迭与杨宪益的自传与传记作品时，无数次为他们起伏的人生和执着的精神唏嘘感动；当我细细品味戴乃迭的译作时，每每沉醉于她那优美的文笔和曼妙的叙事之中；当我了解到戴乃迭在从事翻译时所经历的艰辛磨难时，又不由为之心酸落泪。凡此种种，都坚定了我从事戴乃迭译介活动研究的决心，使我从博士第一年开始一路而行至今，无怨无悔。

戴乃迭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和伟大的中外文化交流家，但迄今关于戴乃迭的研究文献在质和量上却严重不足（详见 2.4）。戴乃迭的文化身份具有特殊性，她嫁给了中国人，在中国生活了六十多年，而她始终保留英国国籍。她是中国外文社聘用的外国专家，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就开始担任《中国翻译》杂志专职翻

译，译介了上百部中国文学作品，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杨宪益生前常这样说：“其实，乃迭比我工作得更努力，她独自翻译了许多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尤其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2010b：225）他认为他的爱人戴乃迭才是一位真正的翻译家。戴乃迭经历了中国社会的浮沉变迁，“文革”期间曾遭受迫害，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同情。她曾说过：“我觉得我有两个祖国。”戴乃迭的译介目的在于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而她的双重民族文化身份以及女性文化身份对她的翻译策略产生着种种错综复杂的影响，由此产生的翻译作品也可以说是各种权力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通过研究戴乃迭的多重文化身份对其译介活动的影响，将为文化转向之后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研究提供重要的资料和宝贵的启示。

一直以来，我对译者主体性和文化身份的研究抱有浓厚的兴趣。2010年我曾申请到校级文科一般科研项目，就“五四”时期代表译者，如林纾、鲁迅等人的主体性进行了相关研究；2011年我又申请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对20世纪具有代表性的外籍译者英译中文著作的策略展开研究。该项目进一步深化了我前期的研究内容，将研究重点转移到了译者的文化身份及其在文化交流中所肩负的职责上。正因为此，我对戴乃迭的研究也始终着眼在其复杂的文化身份及其对译介活动的影响之上。

2013年夏，我有幸应著名翻译学者莫娜·贝克（Mona Baker）之邀，来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中心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学习。我寻访了戴乃迭与杨宪益就读过的牛津大学，以及戴乃迭学习生活了十年之久的柴郡。在戴乃迭的家乡撰写博士论文，令我感觉仿佛与戴乃迭更为亲近了，使我得以更为直观和深刻地理解中英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中国文学在走向世界过程中所面临的艰难困阻。著名翻译学者、文化学派代表人物西奥·赫曼斯（Theo Hermans）在曼大翻译与跨文化中心关于翻译的规范、互文性等做了数次讲座，并悉心解答笔者的疑问，加深了我对翻译与文化间关系的理解。贝克教授为访问学者们提供了良好的研究环境，每周一次的翻译讲座令人受益匪浅，与翻译中心同仁之间的沟通更是开拓了我的研究思路，本研究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与氛围中完成的。

1.2 研究意义与目标

澳大利亚学者皮姆（Anthony Pym）所著的《翻译史研究方法》（*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强调需要用社会学研究方法研究翻译史, 突出翻译与整个社会诸多关系之间的互动关系, 并指出研究译史的目的之一在于帮助我们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在该书的前言部分, 皮姆为翻译史研究制定了四条原则 (2007: xxiii–xxiv) :

(1) 翻译史研究需解释译作为什么会在特定的社会时代和地点出现, 即翻译史应解释翻译的社会起因 (social causation) 问题。

(2) 翻译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不是译本, 不是与译本相关的各种因素, 也不是译本的语言特征, 而只能是作为人的译者 (human translator), 因为只有人具备和社会起因相符合的责任感; 只有通过译者和他们的社会环境 (客户、赞助人、读者), 我们才能去试图理解为什么翻译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间和空间里产生。

(3) 翻译史的重点在于译者, 故翻译史的写作需围绕译者生活及其经历过社会环境展开, 而译者往往是跨文化的。

(4) 翻译史研究应表达、讨论或解决影响我们当前的实际问题。研究历史是为了回应我们的问题, 历史隐含了我们之前未曾考虑到的范畴及潜在的解决办法。

皮姆指出译者在翻译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他认为翻译史所研究的不应是一位译者, 而应该是一群译者。研究者不仅要叙述译者的生平经历, 更重要的是还应注意其作为一位普通的、活生生的人而具有的一切生物特征和习性。历史上的译者大多并非专门以翻译谋生, 因此在研究中应注意译者的多重身份及从事翻译工作的多重目的 (同上: 160–161)。皮姆说道: “多亏了他们的外语和文化知识, 比起那些依靠他们翻译的许多人而言, (译者们) 经常能够走得更远、更轻松。这或许意味着译者们从来不是仅仅‘居于’一种文化或社会……也意味着他们通过至少两种方式运用网络以寻求权力。” (同上: 172)

传统的翻译研究模式是从源语出发到译者, 再到译入语文化, 而不论译者属于哪一种文化。如图所示:



图 1.1 传统的翻译研究模式

皮姆提出了另一种以译者为出发点的研究模式：译者 1，文化，译者 2……因此，翻译史的相关研究环节是以译者开始和结束的。所以，翻译研究空间首先属于由译者以及其他所研究之文化边界上的中间人组成的跨文化链接（同上：1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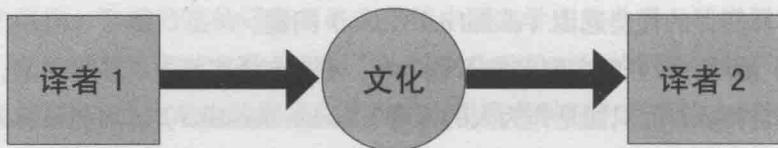


图 1.2 皮姆的翻译研究模式

皮姆将翻译史的研究中心转移到了活生生的译者主体身上，而译者的主体性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到其文化身份的影响。格罗斯伯格指出主体性和文化之间的联系：“所谓的主体性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受到文化核心信念的深刻影响……个人的经验和对其经验的诠释也会对个体的主体性造成影响……自我其实是差异化机制下的产物。”（2010：118–119）文化身份涉及权力关系的问题，即谁在定义，谁决定标准，谁被描述和界定，因此也被称为身份政治。本书正是在皮姆所倡导的翻译史研究原则的指导下，将译者戴乃迭作为翻译研究的中心，但不局限于对这一位译者的研究，重点在于考察译者文化身份对其译介活动的影响及权力因素对译者文化身份的作用。

本研究采用后殖民翻译理论的视角。1978 年萨义德(Edward Said)《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的出版是后殖民理论的滥觞。20 世纪 80 年代，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蓬勃发展，使它渗透到了多种学科和领域中，对人们的思想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改变。1989 年，由阿希克洛夫特(Bill Ashcroft)等人所著的《逆写帝国》(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一书重新定义了“后殖民”的范围，认为从殖民化开始直至今天都属于后殖民时期。1995 年出版的《后殖民研究读本》(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前言中进一步指出，欧洲帝国主义在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层面长期维持着文化统治，与此相伴的是殖民地本土文化的抵抗，“后殖民理论”是用来描绘这种现象的。当被殖民者开始反省和表达由帝国语言与本土经验竞争而有力的混合所带来的紧张时，后殖民“理论”就形成了(赵稀方，2009：14–18)。

1997 年，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的《翻译与帝国》(Translation and

Empire) 正式提出了“后殖民翻译研究”这一术语，罗宾逊对“后殖民”的定义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其中第三个阶段是从文化间的权力关系角度研究所有的文化/社会/国家/民族；征服者的文化是如何让被征服文化征服的；被征服文化是如何应对、适应、抵抗或克服面临之压力的。这里的“后殖民”指的是 20 世纪末我们对于政治和文化权力关系的看法，时间跨度为所有的人类历史 (1997a: 14)。这个阶段也可以称为权力关系研究，以整个人类历史为背景，有助于我们澄清历史上及当前的一些现象。这就使得后殖民理论研究从狭隘的殖民与被殖民、政治与地域的统治延伸到文化的控制与反控制，从而获得了极为广阔的视野。

继罗宾逊之后又有许多学者对后殖民翻译研究作了探讨，如巴斯内特和特里维蒂 (Susan Bassnett & Harish Trivedi) 合编的《后殖民翻译——理论与实践》(*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1999)；西蒙与圣-皮埃尔 (Sherry Simon & Paul St-Pierre) 合编的《变换术语——后殖民时代的翻译》(*Changing the Terms—Translating in the Postcolonial Era*) (2000)；根茨勒 (Edwin Gentzler) 的修订版《当代翻译理论》(*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2001)；提莫志科 (Maria Tymoczko) 与根茨勒合编的《翻译与权力》(*Translation and Power*) (2002) 等等。在后殖民翻译理论视阈下，译者的主体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张扬，译者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力。译者可以通过选择其翻译策略来体现其文化态度，在翻译中揭示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并抵制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为弱小民族和文化争夺与强势文化并存的平等地位。

后殖民翻译理论对于文化身份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个层面：(1) 译者的文化身份是如何影响其译介活动的，包括文本的选择和策略的运用等；(2) 译者的译介活动是如何塑造本土以及异域的文化身份的。这两个层面是紧密联系的，译者的文化身份制约了其译介活动，而其译介活动又塑造了民族的文化身份，民族的文化身份则会进一步影响译者的文化身份。如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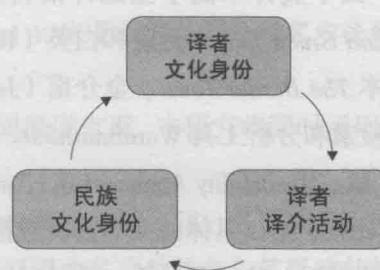


图 1.3 译者文化身份、译者译介活动与民族文化身份间的互动关系

本研究希望达成如下目标：

(1) 揭示译者文化身份对其译介活动的影响

戴乃迭的文化身份具有特殊性，既融合了东西方不同的民族文化身份，又受到其女性文化身份的影响。因此，通过对戴乃迭文化身份及译介活动之间关系的研究，将更好地揭示译者文化身份对于翻译的作用。本研究通过对戴乃迭生平的叙述、文化身份的分析、从事翻译活动时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环境、译作的研究等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试图从后殖民的角度揭示权力因素对于译者文化身份的作用，及译者文化身份对于译本选择、翻译策略运用等的影响。

(2) 展现译者译介活动对民族文化身份的塑造作用

如前文所述，译者的文化身份制约了其译介活动，而其译介活动又塑造了民族的文化身份。本研究以译者戴乃迭为中心，考察戴乃迭在译介中国文学时的社会历史语境及其译介作品的海外接受情况，从而探讨戴乃迭译介活动对构建中国民族形象的作用，以全面客观地对戴乃迭的译介活动做出评价。

(3) 剖析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的权力因素，并给出相关建议

正如皮姆指出的，翻译史的研究应以译者为中心，并且应表达、讨论或解决影响我们当前的实际问题。本研究正是借助对戴乃迭这一译者及其他相关译者的考察，以揭示中国文学在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至 80 年代这个阶段的对外译介情况，及制约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种种权力因素。我希望通过本研究，对于目前的热点议题——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给出相关的建议和看法。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方面，本书为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结合运用。

一方面，本研究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以语料库作为辅助研究手段。我自行创建了沈从文《边城》四个英译本的小型翻译语料库，包括项美丽（Emily Hahn）的译本 *Green Jade and Green Jade*、金隄和白英（Robert Payne）合译的 *The Frontier City*、戴乃迭的译本 *The Border Town*、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的译本 *Border Town*，通过语料库检索和分析工具 WordSmith5.0、AntWordProfiler1.200w、英语词性标注器 2012 广外版、Readability Analyzer1.0、AntConc3.3.5w、Concordance 3.2 软件对这四个译本进行比较，给出具体的文本分析数据，包括词汇密度、句子基本情况、易读指数、高频词汇、独特词汇等。通过对比不同译本之间的数据，以归纳它们各自的特点，并由此展示戴乃迭独具特色的翻译风格。